

政治·外交

# 南亚东南亚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互动

富育红

**摘要：**现代恐怖主义在国际化和本土化频繁互动中获得能量，不断演化。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国际反恐压力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同时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目标、战术和形态不断调整、变化。在“基地”组织渗透下，南亚东南亚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经历重组与联合，战略目标由国内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目标。巴基斯坦塔利班、“虔诚军”“伊斯兰祈祷团”和“阿布沙耶夫集团”等南亚、东南亚主要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发展轨迹深受“基地”组织影响。目前，“基地”组织在南亚地区根基深厚，在地区“圣战”组织网络中享有重要地位，但该组织在东南亚地区日渐消沉。“伊斯兰国”的崛起和渗透对东南亚安全与稳定构成新的、更大的挑战。在“伊斯兰国”渗透下，南亚、东南亚地区本土自主性个体/小组和女性实施的暴恐活动增多，少数族裔和宗教场所成为重要袭击目标，阿富汗和菲律宾南部成为中国周边地区“伊斯兰国”暴恐活动的中心。虽然“伊斯兰国”未能在南亚“圣战”活动网络中建立主导地位，根基较弱，但南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也可能为“伊斯兰国”极端暴力分子的死灰复燃提供沃土。对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互动问题的探究，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恐怖主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进一步考察我国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演变趋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南亚；东南亚；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互动

**收稿日期：**2021-11-28

**作者简介：**富育红（1983—），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南亚地区安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恐怖主义的微型化发展及对策研究”（18CGJ029）的阶段性成果。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是当代国际社会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他们都是在地方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圣战”萨拉菲现象。<sup>①</sup>实

---

<sup>①</sup> 信奉“圣战”萨拉菲主义的逊尼派武装组织（分子）被称为“圣战”组织（分子）。参见Peter R. Dean, “IS and al-Qaeda”, in Jack Covarrubias, Tom Lansford and Robert J. Pauly, Jr., *The New Islamic State: Ideology, Religion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shgate Publishing, 2016, p.65。

际上，本土化是恐怖主义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基本规律，恐怖主义国际化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地区本土化的过程，国际化与本土化就像硬币的两面，实为一体。那么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对区域性极端暴力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回答该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渗透，以及该地区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调整和变化。对该问题的探究，不仅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恐怖主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进一步考察中国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演变趋向的基础，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有效的反恐与反极端主义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 一、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织与转向

“9·11”以后，恐怖主义问题相关文献比比皆是。很多学者注意到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互动的现象和趋势。在美国反恐问题专家大卫·C·拉波波特提出的“四波”现代恐怖主义的基础上，美国学者杰弗里·卡普兰认为“第五波”恐怖主义已经出现，其主要特征是本土性和内向性。尽管本土恐怖主义仍然与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恐怖主义组织存在联系或建立了某种结盟关系，并受到全球化和跨国活动的影响，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力仍具有本土性，地方环境是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分子）行动的催化剂。<sup>①</sup>同时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也赋予本土极端暴力组织以力量，使后者成为各地区危机和战乱中的重要角色。<sup>②</sup>

其他一些学者强调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与各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联系和互动共同推动了全球“圣战”活动的发展。比如美国反恐学者阿萨夫·莫哈达姆认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主要国际“圣战”组织通过知识共享、资源共享、联合训练与合作行动等形式，与其他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招募外国战斗人员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信息。无论他们之间是通过“本地”连接还是“在线”连接，都为全球“圣战”活动提供了支持的源泉。<sup>③</sup>另外还有很多学者注意到，在（特别是西方国家）城市地区出现的本土恐怖主义也与全球“圣战”活动的发展互为因果。比如美国反恐问题专家马克·萨奇曼认为，在“基地”组织无领导“圣战”活动的影响下，很多西方国家自极端化的自主性个体和小

---

<sup>①</sup> George Michael, *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

<sup>②</sup> Lorenzo Meloni, “Exploiting Disorder: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pecial Report, March 14, 2016, <https://www.crisisgroup.org/global/exploiting-disorder-al-qaeda-and-islamic-state>.

<sup>③</sup> Assaf Moghadam, “Nexus of Global Jihad: Understanding Cooperation Among Terrorist Actors”, September 2019, <http://cup.columbia.edu/book/nexus-of-global-jihad/9780231165365>.

组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学者格蕾丝·N. 帕克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联结了不同地区的团体和个人，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圣战”。<sup>②</sup>总之，现代恐怖主义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频繁互动中获得能量，不断演化。

在恐怖主义国际化与本土化互动中，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目标具有国际性，而本土极端暴力组织主要关注地方议程，前者希望将后者融入其全球战略目标。<sup>③</sup>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过去主要关注本土性目标的极端暴力组织，开始参与反美反西方“圣战”，出现了“国际化”的倾向。本土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转向不仅扩大了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他们自身也成为国际“圣战”活动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21世纪初期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实施地区化和分散化战略，积极发展地区化的分支机构，与世界各地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形成与国际反恐联盟较量的多条战线。<sup>④</sup>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通过支持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地方主题，获取额外的“政治空间”。双方基本上建立了共生关系。<sup>⑤</sup>这种双向进程构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内容。

## 二、南亚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新特征

21世纪初期，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影响下，南亚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南亚东南亚地区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大多朝着分散化、去中心化方向发展。在南亚地区，大部分“圣战”组织具有非等级式、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这种去中心化结构使他们能够更加迅速地调整和适应军事压力与环境变化。<sup>⑥</sup>比如“巴基斯坦先知之友”“羌城军”、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虔诚军”“俾路支解放军”等南亚地区主要武装组织都朝着松散型组织结构发展。在东南亚地区，2002年巴厘岛爆炸事件后10余年间，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反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瓦解或削弱了“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集团”等地区大型武装组织。这些组织或分裂成不同的小分支，或重新组合，多以微型小组开展

<sup>①</sup> Jytte Klausen,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the Evolution of Al Qaeda-Inspired Violent Extre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2015”, November 2016, <https://www.ojp.gov/pdffiles1/nij/grants/250416.pdf>.

<sup>②</sup> Grace N. Parker, “The Terror Next Door: A Security Analysis of the Escalating Threat of Lone Wolf Terrorists”, in Aaron Richman and Yair Sharan ed., *Lone Actors-An Emerging Security Threat*, Netherlands: IOS Press BV, 2015, pp.26–27, p.35.

<sup>③</sup> Syed Saleem Shahzad, *Inside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Beyond Bin Laden and 9/11*,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xvii.

<sup>④</sup> 余建华等：《恐怖主义的历史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页。

<sup>⑤</sup> 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詹姆斯·M.卢德斯著，胡澈、李莎、耿凌楠译：《反恐大战略——美国如何打击恐怖主义》，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sup>⑥</sup> Siddhartha Roy, “Bangladesh’s New Generation of Militants”, January 2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bangladeshs-new-generation-of-militants/>.

活动。2014年以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萨拉菲活动中竞争加剧，南亚、东南亚本土恐怖主义活动更为分裂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恐怖主义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这些微型组织的暴恐袭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造成的破坏也相对较小，但他们实施的暴恐活动却越来越频繁，也更加难以预防。恐怖主义威胁分散化增加了各国的反恐难度，使得反恐机构不得不分散资源或采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对付不同的派别。

其次，南亚东南亚地区受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鼓舞的个体和自主性细胞型恐怖活动增多。早在1990年代，“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就呼吁海外穆斯林个体加入“圣战”活动。“9·11”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被摧毁，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致力于构建“基地”组织全球自主性小组和个体构成的网络。<sup>①</sup>特别是经历了持续的军事压力后，“基地”组织核心部分公开宣称不鼓励支持者和同情者前往冲突区域参战，而是号召他们在没有大型组织的帮助下，在本土自行实施袭击活动。<sup>②</sup>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极端叙事、互联网为个体与更广泛的极端网络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建立了桥梁。与其他极端团体相比，“伊斯兰国”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传播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量非“伊斯兰国”媒体中心不断出版和发布“伊斯兰国”官方媒体材料，使得“伊斯兰国”极端叙事能够保持持续的在线存在。<sup>③</sup>在“伊斯兰国”的影响下，南亚东南亚地区极端组织支持者和同情者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十分活跃。在该地区，近年受“伊斯兰国”影响的本土“独狼”式恐怖袭击频发，个体极端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在自主性微型恐怖活动增多的情况下，南亚东南亚各国去极端化和反极端化工作也面临更多挑战。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重创以后，大量“伊斯兰国”成员及支持者返回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该地区外国战斗人员回流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增加。这些回流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地区武装暴力网络中扮演了新的角色。特别是由于他们具备一定的战斗经验、武器知识、极端意识形态，以及与跨国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因而能够为当地极端团体或个人提供专业指导甚至是物资与资金支持，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土恐怖主义发展。据估计有数百名东南亚籍武装分子曾前往中东地区与“伊斯

---

<sup>①</sup> Alia Brahimi, “Al-Qaida and the 9/11 Decade”, in Richard English ed., *Illusions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

<sup>②</sup> Caroline Joan S. Picart, “The Radicalization of American Lone Wolves in Real/Reel Worlds: Strategically Mapping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and Beyond, in the Case of Colleen LaRose(Jihad Jane) and the Tsarnaev Brothers(the Boston Marathon Bombers)”, in Aaron Richman and Yair Sharan ed., *Lone actors-An Emerging Security Threat*, Netherlands: IOS Press BV, 2015, p.59.

<sup>③</sup> Tore Refslund Hamming, “Global Jihadism after the Syria War”,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13, No.3, June 2019, pp.1–16.

兰国”并肩作战，尽管他们的数量远低于欧洲、北非和南亚等地区，但东南亚地区边界管制相对薄弱，引发了人们对外国战斗人员回流或开展跨境袭击的担忧。<sup>①</sup>此外，由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面临巨大压力，该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分支活动对他们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阿富汗塔利班重返政权后，据悉“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计划招募更多的外国战斗人员前往阿富汗。这表明了“伊斯兰国”利用该地区的不稳定来重建其全球“圣战”品牌的意图。<sup>②</sup>

### 三、“基地”组织的渗透与南亚东南亚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演化

“基地”组织核心在南亚地区根基深厚，近年来该组织加强了与南亚其他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关系。“基地”组织在1990年代就已向东南亚地区渗透，但2010年后在该地区日渐消沉。“基地”组织的渗透和影响推动了南亚东南亚地区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重组与联合，并促使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战略目标由国内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目标。

#### （一）“基地”组织的渗透

“基地”组织核心部分的根基在南亚地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对“基地”组织核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基地”组织正在衰落。在2020年《华盛顿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基地”组织研究专家丹尼尔·拜曼表示，该组织不太可能“恢复其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圣战’组织的角色”。但通过对“基地”组织核心在南亚地区活动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基地”组织核心不仅没有被摧毁，而且它在地区“圣战”组织网络中仍享有重要地位。<sup>③</sup>“9·11”后，“基地”组织核心将重点从全球恐怖袭击和外部行动转移到支持南亚等地区本土“圣战”组织。借助该地区本土“圣战”盟友的支持，“基地”组织核心得以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打击下继续生存和发展。<sup>④</sup>2014年，“基地”组织核心建立了南亚分支。“基地”组织南亚分支的章程强调以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和存在为主要目标，但他们也可能利用其不

<sup>①</sup> Name redacted Specialist in Terror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5, 2017,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

<sup>②</sup> Raffaello Pantucci, “Jihadist will Remain a Threat under the Taliban Government”, September 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29cf8b38-9147-4c5a-b13a-f8a74e5eaa6b>; Tanya Mehra LL.M and Matthew Wentworth,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Regional Responses and Security Threats”, August 27, 2021, <https://icct.nl/publication/the-rise-of-the-taliban-in-afghanistan-regional-responses-and-security-threats/>.

<sup>③</sup> Asfandyar Mir, “Afghanistan’s Terrorism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Trajectories of al-Qaeda, the Afghan Taliban, and the Islamic State”,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fghanistans-terrorism-challenge-political-trajectories-al-qaeda-afghan-taliban-and>.

<sup>④</sup> Abdul Saye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l-Qaeda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ugust 20, 2021, <https://thesoufancenter.org/intelbrief-2021-august-20/>.

断增长的能力针对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等目标发动攻击。<sup>①</sup>

“基地”组织核心领导人始终希望扩大“圣战”战场，实现其全球性战略目标。<sup>②</sup>为此，虽然“基地”组织核心人数较少，但他们竭力在各种极端团体之间架起桥梁，阿富汗、巴基斯坦国内大部分逊尼派伊斯兰武装团体都与之建立了程度不等的联系。来自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中心（CTC）的唐·拉斯勒指出，“基地”组织核心在巴基斯坦不同武装派别的联合中起到协调与联盟建设的作用。<sup>③</sup>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基地”组织核心促成了巴塔的统一，并将战斗目标扩大至巴基斯坦国内。<sup>④</sup>近年来，“基地”组织核心进一步加强了与其他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关系。在失去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联盟后，“基地”组织改善了与其他中亚极端暴力组织的关系。目前，“基地”组织在南亚地区仍维持着由不同武装团体构成的复杂联盟网络，“基地”组织为本土组织提供战略和思想指导。<sup>⑤</sup>此外，“基地”组织还保留着关键的武器能力。“基地”组织仍在南亚地区维持着“化生放核”部门的运行，他们在技术上可能不成熟，但资金充裕，并一直试图在黑市上进行核材料交易。<sup>⑥</sup>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地区，“基地”组织马尼拉分支小组十分活跃，随后他们将活动扩展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基地”组织领导层还利用东南亚国家作为募资和洗钱的场所。与此同时，“基地”组织为“伊斯兰祈祷团”“阿布沙耶夫集团”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本土极端武装组织提供资金和培训，并与之合作。“9·11”之后，东南亚被视为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二战线”。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加强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网络动员，进一步煽动、武装和资助地方团体对美国等西方目标发动袭击。在“基地”组织的影响下，很多东南亚极端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战略目标发生调整，逐渐从赢得领土斗争转变为实施“圣战”。21世纪初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多次爆发自杀式爆炸袭击和路边炸弹袭击事件，他们实施的暴恐活动比过去更具规模性和血腥性。

<sup>①</sup> Asfandyar Mir, “Afghanistan’s Terrorism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Trajectories of al-Qaeda, the Afghan Taliban, and the Islamic State”,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fghanistans-terrorism-challenge-political-trajectories-al-qaeda-afghan-taliban-and>.

<sup>②</sup> Syed Saleem Shahzad, *Inside Al-Qaeda and the Taliban*,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p.206.

<sup>③</sup> Jayshree Bajoria and Jonathan Masters,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September 26, 2012, <http://www.cfr.org/pakistan/pakistans-new-generation-terrorists/p15422>.

<sup>④</sup> 富育红：《阿富汗主要反叛团伙及其关联》，《南亚研究季刊》，2015年第1期，第30—38页。

<sup>⑤</sup> Raffaello Pantucci and Abdul Basit, “Post-Taliban Takeover: How the Global Jihadist Terror Threat May Evolve”,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13, No.4, September 2021, pp.1–7.

<sup>⑥</sup> Asfandyar Mir, “Afghanistan’s Terrorism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Trajectories of al-Qaeda, the Afghan Taliban, and the Islamic State”,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afghanistans-terrorism-challenge-political-trajectories-al-qaeda-afghan-taliban-and>.

## (二) 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演化

首先，“基地”组织渗透促进了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重组与联合。自“基地”组织成立以来，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一直采取行动防止“圣战”阵营内部的不和，并竭力维持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国际联盟”。为避免与其他组织竞争，“基地”组织主要充当促进者的角色，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逊尼派武装分子提供培训、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南亚地区，巴塔的两次重大重组都是在“基地”组织的促成和推动下实现的。第一次是在2007年，在“基地”组织的推动下，由大约40支部落武装形成的反巴基斯坦政府的塔利班正式成立。第二次发生在2020年，巴塔的再次重组和统一也是在“基地”组织的支持下完成的。在“基地”组织的帮助和指导下，复苏后的巴塔与旁遮普塔利班部分派别、“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其他外籍极端暴力组织的联系增强。<sup>①</sup>巴塔的重组以及该地区各极端暴力组织联系的加强，扩大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活动范围和组织能量，对南亚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又如，巴基斯坦“虔诚军”的发展轨迹也深受“基地”组织的影响。“9·11”之前，“虔诚军”在拉合尔郊外的木里迪克大本营是在本·拉登的帮助下建立的。“虔诚军”与“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相似，并具有类似的“圣战”目标、全球视野和国际抱负。在“基地”组织影响下，“虔诚军”与很多志同道合的外籍恐怖主义组织合作或结盟。<sup>②</sup>

在东南亚地区，“伊斯兰祈祷团”的发展与“基地”组织的支持密切相关。1985年，“伊斯兰祈祷团”创始人阿布·巴卡尔·巴西尔和阿卜杜拉·松卡在马来西亚建立了一个行动基地，并帮助将印度尼西亚人和马来西亚人送往阿富汗与苏联作战，后来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接受训练。1990年代中期，阿布·巴卡尔·巴西尔和阿卜杜拉·松卡将他们的组织合并到“基地”组织“圣战”网络，同时积极招募东南亚武装分子。<sup>③</sup>虽然“伊斯兰祈祷团”具有很高的决策和行动自主性，但它仍属于“基地”组织全球“圣战”网络的一部分。21世纪初期，新加坡炸弹阴谋失败和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爆发之后，“伊斯兰祈祷团”受到政府反恐行动的打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祈祷团”在该地区的联系有所削弱。2007年6

<sup>①</sup> Abdul Sayed and Tore Hamming, “The Revival of the Pakistani Taliban”, *CTC Sentinel*, Vol.11, Issue 6, June/July 2018, pp.28–36; Colin Clarke, “Twenty Years After 9/11: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Jihadi Movement?”, *CTC Sentinel*, Vol.14, Issue 7, September 2021, <https://ctc.usma.edu/twenty-years-after-9-11-what-is-the-future-of-the-global-jihadi-movement/>.

<sup>②</sup> Ashley J. Tellis, “The Menace That Is Lashkar-e-Taib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1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LeT\\_menace.pdf](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LeT_menace.pdf).

<sup>③</sup> Mark Manyin, Richard Cronin, Larry Niksch and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ovember 18, 2003,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t/terrorism-in-southeast-asia.html>.

月，“伊斯兰祈祷团”主要领导人尤斯龙·马布迪被捕，该组织的整体行动能力遭受重大打击。目前“伊斯兰祈祷团”已经朝着碎片化方向发展。<sup>①</sup>

在菲律宾，早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阿布沙耶夫集团”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91年，“阿布沙耶夫集团”由从阿富汗返回东南亚的前“圣战”者创立。自1990年代初以来，“阿布沙耶夫集团”与“基地”组织保持联系，并为“伊斯兰祈祷团”提供庇护。“基地”组织曾派遣（负责实施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拉姆齐·阿哈穆德·尤塞夫为其成员提供军事训练。1997年美国将“阿布沙耶夫集团”列入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FTO）。21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将菲律宾指定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后，削弱了菲律宾的“圣战”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基地”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布沙耶夫集团”日益演化为一个犯罪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绑架、勒索和贩毒等。<sup>②</sup>

其次，“基地”组织渗透使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战略目标由国内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目标。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期，巴塔多次加入打击驻阿富汗西方部队的战斗，巴塔在国内实施的一些暴恐行动也是与“基地”组织共同策划的，巴塔的很多战术（如自杀式炸弹袭击和炸毁学校等）也是从“基地”组织那里习得的。<sup>③</sup>2008年，巴塔曾与“基地”组织合作策划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爆炸案，他们还计划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英国进行后续袭击。2010年，巴塔在没有“基地”组织批准或帮助的情况下，试图对纽约时代广场实施炸弹袭击。<sup>④</sup>“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战术也对“虔诚军”产生巨大影响。1998年8月美国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发动导弹袭击，曾导致不少“虔诚军”成员死亡。此后，“虔诚军”正式宣布对美国发动“圣战”，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打击美国利益的各种行动，同时也加强了与“基地”组织的合作。<sup>⑤</sup>创建初始的“虔诚军”主要是一个关注在克什米尔地区开展暴力行动的反印度组织，在“基地”组织的影响下，“虔诚军”逐

---

<sup>①</sup> Andrew T.H. Tan, “The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it Can be Improved”,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0(3), 2008, pp.199–21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0163270802309063>.

<sup>②</sup> Name redacted Specialist in Terror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5, 2017,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

<sup>③</sup> Stephen Tankel, “Pakistani Militancy in the Shadow of the U.S. Withdrawal”, in C. Christine Fair and Sarah J. Watson ed., *Pakistan’s Enduring Challen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36

<sup>④</sup> Colin Clarke, “Twenty Years After 9/11: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Jihadi Movement?”, *CTC Sentinel*, Vol.14, Issue 7, September 2021, <https://ctc.usma.edu/twenty-years-after-9-11-what-is-the-future-of-the-global-jihadi-movement/>.

<sup>⑤</sup> Ashley J. Tellis, “The Menace that is Lashkar-e-Taib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1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LeT\\_menace.pdf](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LeT_menace.pdf).

渐展现出全球野心，并建立了全球联系网络。<sup>①</sup>

在“基地”组织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目标也发生了“国际化”转向。比如2002年初，“伊斯兰祈祷团”高级领导人决定攻击亚洲地区“软目标”，包括西方人经常去的旅游景点和西方企业。<sup>②</sup>“伊斯兰祈祷团”与“基地”组织曾共同计划在新加坡发动针对西方大使馆、美国公司、美国船只和军事人员及军事设施的重大恐怖袭击，不过他们的袭击计划最终被挫败。<sup>③</sup>2002年10月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伊斯兰祈祷团”和“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并标志着“伊斯兰祈祷团”战略目标的转变。

#### 四、“伊斯兰国”的渗透与南亚东南亚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演化

“伊斯兰国”尚未在南亚武装活动网络中建立主导地位，但仍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伊斯兰国”崛起后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新的、更大的挑战。在“伊斯兰国”的渗透和影响下，南亚东南亚本土自主性个体、小组和女性实施的暴恐活动增多，少数族裔和宗教场所成为重要袭击目标，阿富汗和菲律宾南部成为该地区“伊斯兰国”暴恐活动的中心。

##### (一) “伊斯兰国”的渗透

截止到2019年，尽管中东地区“伊斯兰国”核心部分几乎被摧毁，但该组织仍继续在中东、非洲、阿拉伯半岛和亚洲地区发展秘密网络。迄今为止，它的战略侧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在线活动宣传其“圣战”思想，推动年轻人走上极端化道路，并利用现有的联系网络在各地区组建本土恐怖小组，同时利用外国战斗人员来维持各地区恐怖小组与“伊斯兰国”的关系。<sup>④</sup>

有迹象表明，南亚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可能为“伊斯兰国”极端暴力分子死灰复燃提供了有利土壤。在该地区，“伊斯兰国”重点关注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活动。虽然该组织无法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武装活动网络中建立主导地位，但它仍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除了阿富汗之外，“伊斯兰国”还在巴基斯坦全国设立了多个蛰伏小组，它曾在信德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sup>①</sup> Rashmi Singh,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Successes, Failur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Richard English ed., *Illusions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9

<sup>②</sup> Mark Manyin, Richard Cronin, Larry Niksch and Bruce Vaughn,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ovember 18, 2003,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t/terrorism-in-southeast-asia.html>.

<sup>③</sup> Andrew T.H. Tan, “The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Asia-Pacific: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w it Can be Improved”,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0(3), 2008, pp.199–21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0163270802309063>.

<sup>④</sup> Amarnath Amarasingam, Shweta Desai, “ISIS in South Asia: Struggle for Survival Beyond ‘Khorasan’”, July 29, 2020,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isis/isis-in-south-asia-struggle-for-survival-beyond-khorasan/>.

和俾路支省等地区发动数十起恐怖袭击事件。目前该组织继续试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拓领土，招募武装分子，并吸引其他极端暴力组织的叛逃者。<sup>①</sup>2019年5月，“伊斯兰国”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巴基斯坦省”，目标是加强“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自主行动的能力，并聚集本土极端暴力组织，比如巴塔部分派别、“自由人党”“羌城军”“正义军”和“真主旅”等，通过引导他们的当地议程来吸引新成员。<sup>②</sup>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古纳拉特纳认为，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国”还在南亚地区以印度、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为节点建立了网络。<sup>③</sup>比如马尔代夫成为“伊斯兰国”渗透和活动的热点地区。自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声称与马尔代夫境内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该地区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希望通过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而迅速扬名。<sup>④</sup>除了恐怖行动之外，“伊斯兰国”重视其意识形态对当地伊斯兰武装活动的长期影响。受“基地”组织的宣传活动启发，“伊斯兰国”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了其全球“圣战”叙事。“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和官方出版物Dabiq、Rumiyah和al Naba频繁提及南亚国家。2020年2月，“伊斯兰国”推出了致力于推广南亚“圣战”活动的期刊《印地语之声》，并以印地语、乌尔都语、迪维希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马拉雅拉姆语等语言出版，旨在鼓励支持者在南亚地区作战，并彰显该组织全球“圣战”意识形态的区域适应性。在南亚地区本土武装组织和武装分子的帮助下，“伊斯兰国”成功地将很多“圣战”团体或犯罪集团吸引到其网络中，并将当地的不满和冲突重新纳入其全球“圣战”活动。<sup>⑤</sup>总之，虽然目前很难判断“伊斯兰国”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其在南亚地区的多条战线，但该组织继“基地”组织之后重新焕发了全球“圣战”的活力。

2014年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崛起，为东南亚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带来鼓舞和支持，并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新的、更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遭到重创后，东南亚随之成为暴恐分子回流、开辟“伊斯兰国”新战场的地

---

<sup>①</sup> Farhan Zahid, “Jihadism in South Asia: A militant landscape in flux”, January 8, 2020,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jihadism-south-asia-militant-landscape-flux>.

<sup>②</sup> Amarnath Amarasingam and Shweta Desai, “ISIS in South Asia: Struggle for Survival Beyond ‘Khorasan’”, July 29, 2020,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isis/isis-in-south-asia-struggle-for-survival-beyond-khorasan/>.

<sup>③</sup> Gavin Fernando, “‘Islamic State is in Rebuilding Mode’: Terror Group Enters Chilling New Phase”, April 24, 2019, <https://www.news.com.au/world/asia/islamic-state-is-in-rebuilding-mode-terror-group-enters-chilling-new-phase/news-story/23b6862975df7bca4cfc0fc07bdd271a>.

<sup>④</sup> Shyam Tekwani, “Political Violence in South Asia: 1995–2020”, September 6, 2020, <https://apcs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06-tekwani-25A.pdf>.

<sup>⑤</sup> Amarnath Amarasingam and Shweta Desai, “ISIS in South Asia: Struggle for Survival Beyond ‘Khorasan’”, July 29, 2020, <https://newlinesinstitute.org/isis/isis-in-south-asia-struggle-for-survival-beyond-khorasan/>.

区之一。曾有学者将东南亚地区称为“伊斯兰国”的“第二战线”。<sup>①</sup>也曾有数百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马来群岛战斗小组”与“伊斯兰国”并肩作战。2014年，首批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团”和“东印尼真主战士”。2016年，“伊斯兰国”宣布“阿布沙耶夫集团”首领哈皮隆为该组织的菲律宾分支领导人。2016至2017年是“伊斯兰国”在东南亚招募的高峰期，各类本土极端暴力组织都在争取获得“伊斯兰国”的认可。2018年，“伊斯兰国”正式宣布成立东南亚省分支，范围涵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南部和缅甸。此前，“伊斯兰国”已经宣布在菲律宾南部建立了两个当地行省，一个是菲律宾行省，另一个是东亚行省。在一些案例中，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回流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实施袭击或支持本土“伊斯兰国”分支。比如2018年7月，一名摩洛哥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菲律宾南部实施了自杀式恐怖袭击，这是外国战斗人员首次参与该国的恐怖袭击活动。同年，菲律宾移民局阻止了一名巴基斯坦籍“伊斯兰国”成员入境。除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受到“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和附属机构崛起的影响。比如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附属机构“神权游击队”及受“伊斯兰国”启发的“独狼”恐怖分子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 （二）本土极端暴力活动的演化

首先，本土自主性个体和小组暴恐活动增多，少数族裔和宗教场所成为重要袭击目标。受到“伊斯兰国”鼓舞的极端个体和小组试图在不同宗派群体之间制造紧张关系，强化“宗教战争”正在进行的假象。在南亚地区，自2014年“伊斯兰国”成立以来，巴基斯坦执法机构在境内发现了至少四个支持“伊斯兰国”的自主性小组。<sup>②</sup>他们在国内已实施多起小规模袭击事件，包括枪击安全人员和针对什叶派哈扎拉族民众的暴力事件。2019年4月斯里兰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该地区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层没有直接联系的本土极端暴力小组支持“伊斯兰国”的目标和战术，并有在非相关国家实施袭击的倾向。<sup>③</sup>2021年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之后，阿富汗主要城市地区什叶派清真寺多次遭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袭击。在东南亚地区，自从2016年1月雅加达市中心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印度尼西亚国内“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该国国民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约声称，印度尼西亚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存在“伊斯兰国”的蛰伏细胞小组。这些人的思想都已

<sup>①</sup> Mona Kanwal Sheikh, “The Traction of Transnational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in Mona Kanwal Sheikh, Lars Erslev Andersn, Nicholas Chan and Hara Shintaro, *Global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Denmark: Tarm Bogtryk, 2019, p.8.

<sup>②</sup> Farhan Zahid, “The Islamic State in Pakistan: Growing the Network”, January 3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slamic-state-pakistan-growing-network>.

<sup>③</sup> Mona Kanwal Sheikh, “The Traction of Transnational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in Mona Kanwal Sheikh, Lars Erslev Andersn, Nicholas Chan and Hara Shintaro, *Global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Denmark: Tarm Bogtryk, 2019, p.7.

经极端化，一旦受到诱发就会行动起来。<sup>①</sup>他们主要针对国家政权机构和其他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实施零星式暴恐袭击。比如2019年支持“伊斯兰国”的印度尼西亚籍夫妇在菲律宾制造了和乐大教堂恐怖袭击事件。<sup>②</sup>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能够为受到削弱的当地“圣战”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并利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使用的策略攻击什叶派穆斯林，煽动教派仇恨和暴力，试图重新点燃跨境“圣战”恐怖主义活动。<sup>③</sup>

其次，在活动地点方面，阿富汗和菲律宾南部成为南亚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国”暴恐活动的中心。阿富汗塔利班重返政权后不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城市地区接连发动恐怖袭击。这些袭击事件表明，尽管阿富汗塔利班、前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驻阿富汗美军为摧毁“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组织仍具有弹性，仍具有成功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潜在力量。<sup>④</sup>阿富汗塔利班重返政权期间，“伊斯兰国”利用当地的混乱招募更多战斗人员，获得更多武器与重新集结的机会。“伊斯兰国”正在将其足迹扩展到整个阿富汗。<sup>⑤</sup>

随着“伊斯兰国”试图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和菲律宾南部站稳脚跟，外国“圣战”分子也不断涌人这些地区。自2014年以来，“阿布沙耶夫集团”展示出重新实施暴恐活动的能力，并试图联合菲律宾其他本土极端暴力组织共同行动。“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渗透，以及“阿布沙耶夫集团”的重组引起了广泛担忧。<sup>⑥</sup>2016至2017年，“伊斯兰国”鼓励其东南亚支持者前往菲律宾南部地区发动“圣战”，而不是向中东方向迁徙。2018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镇压后，人们担心该组织加强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存在。特别是由于菲律宾南部地区叛乱活动频

---

<sup>①</sup> 卢光盛、周洪旭：《东南亚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其影响与中国的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3—20页。

<sup>②</sup> Noor Huda Ismail, “Deep Roots and Recent Boosts: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rorist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9/11”, August 16, 2021, <https://thesoufancenter.org/intelbrief-2021-august-16/>.

<sup>③</sup> Peter Chalk, “The History of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Michael A. Sheehan, Erich Marquardt and Liam Collins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U.S. Counterterrorism and Irregular Warfare Oper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117–130, file:///C:/Users/87069/Downloads/10.4324\_9781003164500-11\_chapterpdf.pdf.

<sup>④</sup> Tim Lister, “Kabul Airport Attack Shows Afghanistan is Still a Terror Hotbed that the Taliban will Struggle to Control”, August 27,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8/26/asia/taliban-afghanistan-al-qaeda-intl-cmd/index.html>; “Terrorist Groups in Afghanistan”, CRS Report, August 17, 2021, [<sup>⑤</sup> Saleem Javed, “The Islamic State Factor: How Long Can The Taliban Government Survive?”, October 17, 2021, <https://www.thefridaytimes.com/the-islamic-state-factor-how-long-can-the-taliban-government-survive/>.](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0604?__cf_chl_jschl_tk__=pmd_TXQu7te9dIgQKmVTe1s..HrEKS.B.d0vJAW0xzBdpf98-1634042201-0-gqNtZGzNAhCjenBszQkR; Raffaello Pantucci and Abdul Basit, “Post-Taliban Takeover: How the Global Jihadist Terror Threat May Evolve”,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13, No.4, September 2021, pp.1–7.</p></div><div data-bbox=)

<sup>⑥</sup> Name redacted Specialist in Terror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5, 2017,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20170505_R44501_355e3437898708ad42305150ba1a54c2ebe32c54.pdf).

繁，加上本土组织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跨国联系，使得菲律宾在跨国“圣战”袭击方面具有很大脆弱性。<sup>①</sup>

最后，在“伊斯兰国”的影响下，南亚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很多支持“伊斯兰国”的女性恐怖分子和小组，女性甚至成为推动家庭集体极端化现象的切入点。2001年以后，随着国际反恐战争和各地区冲突不断升级，以及男性成员愈发“储备不足”，“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均采用了女性自杀式爆炸袭击战术，他们甚至通过设立专门的网络电子杂志或社交媒体网站吸引和招募女性加入“圣战”活动。比如“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开设了女性信息办公室，通过网络电子杂志等渠道宣传支持女性参与“圣战”行动和恐怖分子训练营等内容。<sup>②</sup>与“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相比，“伊斯兰国”更为重视女性成员的作用。

“伊斯兰国”是首个对女性发起系统性、专门性招募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伊斯兰国”的宣传和鼓舞下，其他地区的本土极端暴力组织也不断学习“伊斯兰国”的战术，加强了招募和使用女性成员的活动。比如2015年以来巴基斯坦警方通过突击搜查发现了境内多个支持“伊斯兰国”的女性小组，她们主要参与“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的招募与后勤工作。一群来自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附属宗教学校的女学生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前首领巴格达迪。<sup>③</sup>巴塔还模仿“伊斯兰国”大力招募和使用女性恐怖分子，并打造了适合当地环境的新术语“圣战姐妹”。<sup>④</sup>2017年9月，巴塔发布了首本专门用于招募女性的英语在线杂志Sunnat-e-Khaura，呼吁女性加入“圣战”，参加训练营进行军事训练，并针对女性目标群体发布组织的相关活动。<sup>⑤</sup>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女性随丈夫或父兄加入“伊斯兰国”，一些女性在自杀式暴恐袭击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并推动暴力极端主义的实施者从单纯的个人转变为整个家庭。比如201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发生的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就涉

<sup>①</sup> Lars Erslev Andersn, “Transnational Jihadism in the Philippines”, in Mona Kanwal Sheikh, Lars Erslev Andersn, Nicholas Chan, Hara Shintaro, *Global Jihad in Southeast Asia*, Denmark: Tarm Bogtryk, 2019, p.30.

<sup>②</sup> Tanya Narozhna and W. Andy Knight, *Female Suicide Bombings: A Critical Gender Approach*, US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pp.83–91; Sawssan Abou-Zahr, “Reviewing Amel Grami’s Recent Book: Women and Terrorism: A Gendered Study”, April 9, 2018, <https://icanpeacework.org/2018/04/09/reviewing-amel-gramis-recent-book-women-terrorism-gendered-study/>; Mia Bloom, “Women and Terrorism”, January 2017,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124>.

<sup>③</sup> Farhan Zahid, “The Islamic State in Pakistan: Growing the Network”, January 3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slamic-state-pakistan-growing-network>.

<sup>④</sup> Nikita Malik, “Why Do We Underestimate The Role Of Women I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eptember 26,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nikitamalik/2018/09/26/why-do-we-underestimate-the-role-of-women-in-terrorist-organizations/#3fdd979c4722>.

<sup>⑤</sup> Sara Mahmood, “Negating Stereotypes: Women, Gender, and Terrorism in Indonesia and Pakistan”, pp.11–18, <https://extremism.gwu.edu/sites/g/files/zaxdzs2191/f/Negating%20Stereotypes-%20Women%20Gender%20and%20Terrorism%20in%20Indonesia%20and%20Pakistan.pdf>.

及多起“家庭人弹”。据调查，泗水袭击事件由“伊斯兰国”分支“神权游击队”策划。<sup>①</sup>

## 五、结语

现代恐怖主义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频繁互动中获得能量，不断演化。建立地区分支和联盟网络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重要策略，他们支持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地方主题，以便获取额外的“政治空间”和长期运作。“基地”组织的渗透促进了本土极端暴力组织的重组与联合，并使后者的战略目标由国内转向国内国际双重目标。在“伊斯兰国”的渗透下，东南亚地区本土自主性个体、小组及女性实施的暴恐活动增多，少数族裔和宗教场所成为重要袭击目标。

现代恐怖主义是缘起于本土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在南亚东南亚地区落脚，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南亚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社会分裂与经济发展滞缓，中央政府治理能力相对匮乏，以及苏联阿富汗战争和美国反恐战争等，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各种极端暴力组织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样，东南亚部分国家民族冲突问题错综复杂，中央控制薄弱、腐败猖獗、违法犯罪活动盛行，以及边界松懈等原因，使得“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恐怖网络在东南亚的渗透取得重大进展。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推动下，“圣战”活动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了更多的地方武装团体。“就像被粉碎的恶性肿瘤一样，癌细胞已经散布到遥远的地方，感染新的地区，并使以提倡暴力‘圣战’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为代表的疾病长期存在。”<sup>②</sup>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一项全面、有针对性和长远的反恐战略，以应对多样化、富有弹性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

[责任编辑：郑佳]

---

<sup>①</sup> Amira Jadoon Nakissa and Jahanbani Charmaine Willis, “Rising in the East: A Regional Overview of the Islamic State’s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December 2020, <https://ctc.usma.edu/wp-content/uploads/2020/07/Rising-in-the-East-Report-1.pdf>.

<sup>②</sup> Colin Clarke, “Twenty Years After 9/11: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Jihadi Movement?”, *CTC Sentinel*, Vol.14, Issue 7, September 2021, <https://ctc.usma.edu/twenty-years-after-9-11-what-is-the-future-of-the-global-jihadi-movement/>.